

# 要素市场扭曲下中国农民收入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吴国松<sup>1</sup>, 姚升<sup>2</sup>

(1.湖州师范学院 商学院/“两山”理念研究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2.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 基于 28 个省(市、自治区) 1997—2018 年面板数据, 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对数离差值等综合量化分析农民收入地域差异, 并运用 Shapley 值分解方法对要素市场扭曲下农民收入地域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并测度其贡献度。研究发现: 农民收入地区差异呈逐年扩大趋势, 虽有所波动, 但是总体数值趋向于国际收入差距警戒线; 不同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而农村人力资本、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业贸易开放度、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地区工业化水平、涉农政策调整等因素均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要素市场扭曲是农民收入地域差异扩大的首位因素, 涉农政策调整是唯一缩小农民收入地区差异的因素, 其余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收入的地域差异。

**关键词:** 要素市场扭曲; 农民收入; 地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0)04-0012-07

## A study on the change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Chinese farmers' income under the distortion of factor market

WU Guosong<sup>1</sup>, YAO Sheng<sup>2</sup>

(1. School of Business/"Two mountains" Concept Research Institute,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Anhu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Hefei 2300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8 provinces (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1997 to 2018,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farmers' income have been analyzed by using Gini coefficient, Theil index and MLD. By using Shapley value decomposition metho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farmers' income under the distortion of factor market have been decomposed and the contribution degrees of them have been measured. The study has shown tha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farmers' income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lthough fluctuating, the overall value tends to reach the warning line of international income gap. The distortion of factor market in different region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The rural human capital, the scale of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openness of agricultural trad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scale management, the level of reg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related polic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The distortion of factor market is the first factor that causes the expansion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farmers' income, and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related policies is the only factor that reduce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farmers' income, while the other factors have expande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farmers' income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 distortion of factor market; farmers' income; regional differences

###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三农政策的核心任务是保障农民收入持续

增长, 实现农民高水平共同富裕。而中国地域广阔, 自然、社会、经济等条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导致不同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不同地域农民因其所处的市场环境、社会经济等存在显著差异, 收入差距较大。

农民增收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已有学者研究指出, 农民增收缓慢受农产品市场制约<sup>[1,2]</sup>,

收稿日期: 2020-04-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JY110)

作者简介: 吴国松(1979—), 男, 江苏淮安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收入与“三农”问题。

制度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sup>[3-5]</sup>,农民增收难是现代国家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难题<sup>[6,7]</sup>。地域经济总量增长为农民增收奠定了物质基础<sup>[8]</sup>,但是存在一定时滞效应<sup>[9]</sup>,城乡分割的农业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也阻碍了农民增收空间<sup>[10]</sup>。

近年来中国农民收入虽呈快速增长趋势,但农民收入地域差距亦被拉大<sup>[11]</sup>,农民收入地域均衡增长已成为研究热点<sup>[12]</sup>。农民收入水平和地区差异受自身与外界条件多重因素的影响<sup>[13]</sup>,现有研究大多关注自然资源禀赋、生产要素拥有量、发展战略的差异性等<sup>[14-16]</sup>。不同地域农民收入存在地区贡献程度差异现象<sup>[17]</sup>。刘长庚、李谷成等<sup>[18,19]</sup>研究得出,涉农政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变革等能够通过优化农民收入的构成而持续缩小不同地域农民收入差异,此外,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尤其重要。也有学者从地区或地理特征视角将农民收入地域差距直接分解为地区内收入差距和地区间收入差距,考察其对不同地域农民收入差异的贡献<sup>[20-22]</sup>。

对农民收入地域均衡增长问题研究,不能停留于对其各种因素分解上,还需紧扣农民所处的市场化环境探讨农民参与市场化进程中所需要素的配置状况<sup>[23-25]</sup>。中国农民已日益市场化,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带动农民增收的关键在于要素市场发育和体制改革<sup>[26,27]</sup>。已有相关研究得出要素投入与农民增收存在较大关联,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滞后会直接制约农民增收,应完善要素市场配置机制促进农民增收<sup>[28-30]</sup>。

现有研究对农民增收制约因素、收入地域不平衡等展开了深入探讨,却很少关注农民所处市场环境尤其是不同地域要素市场发育状况与农民收入地域差异的关系,要素市场扭曲下农民收入地域差异的变动及成因。鉴于此,本研究将基于回归方程的 Shapley 值分解方法测算要素市场扭曲等变量对农民收入地域差异的影响及其贡献度,解释农民收入地域差异成因,为促进不同地域农民收入平衡增长提供决策参考。

##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

基于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制度,农民收入实质是生产关系中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问题,涉及农民所拥有的各类生产要素数量和要素

市场交易机制。农民增收由特定生产关系下的要素贡献数量与效率决定,初次分配受其拥有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值影响,再分配取决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农民福利与其所拥有人力、物质和金融等有形资源数量质量相关,还与包括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运作机制和效率密切相关,要素市场的运作效率改善是农民福利改善的前提<sup>[31]</sup>。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要素价格会按照市场自由交易规则达到均衡状态,获得要素本身应有的价值,因此要素报酬差距不会存在扩大趋势,会随着要素供需关系的调整而趋于稳定。

农民收入的本质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通过投入各类生产要素而获得相应报酬,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决定了获得报酬的数量和质量。然而中国要素市场改革明显滞后于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等要素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市场交易被扭曲打破了其自动平衡机制,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报酬无法较好地体现其自身价值。不同地域市场经济发育水平、制度性障碍、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和扭曲程度等存在的差异导致了要素所有者获得报酬的差异,制约着要素配置效率和价值实现。在要素市场扭曲下要素供需关系被打破,欠发达地区的资本、劳动等要素,事实上因各种障碍未能实现应有价值,有损市场经济效率,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最终拉大了不同地域要素所有者报酬的差异。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同地域各类要素市场扭曲的程度虽然有所缓解,但仍将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

农民收入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投入产出关系:

$$Y=A \cdot F(K, L, S) \quad (1)$$

(1)式中, $Y$ 代表农民收入, $A$ 代表各类要素配置效率, $K$ 代表资本, $L$ 代表劳动力, $S$ 代表土地。农民拥有要素数量及要素配置效率共同决定了农民收入,研究农民收入就是探讨在不同地域、不同要素所有者、不同市场制度下各类要素聚集、分配等。某一地域因自然、政策等原因使得某类要素资源供给存在数量差异,要素组合和要素配置状态也会出现空间异质性,共同导致要素获得的报酬不同,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农民收入存在显著地域差异。因此要素收益较高的地域会引发其他地域要素流入,会形成多种生产要素聚集状态,不同生产要

素配置方式所形成的要素集聚效率差异,导致收入存在差异化增长。

由于常见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测度指标对于基础数据敏感性不同,为客观、精确测算不同地域农民收入差异及其变化,本研究选取基尼系数(GINI)、泰尔指数(Theil)和对数离差值(MLD)等三大指标进行综合量化分析。基尼系数对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民收入数据变化较为敏感,泰尔指数对处于较高收入水平的收入数据变动较为敏感,而对数离差值则对处于较低收入水平数据变动较为敏感。衡量收入差异的指标值介于0和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收入差异越大,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基尼系数是在洛伦兹曲线基础上演变出的指标,泰尔指数与对数离差均值指数是广义熵指数特殊形式,具体指标构建如下式所示:

$$Gini = \frac{\sum_{i=1}^n \sum_{j=1}^n |y_i - y_j|}{2n^2 \bar{y}} \quad (2)$$

$$Theil = \sum_{i=1}^n p_i \frac{y_i}{\bar{y}} \ln\left(\frac{y_i}{\bar{y}}\right) \quad (3)$$

$$MLD = \sum_{i=1}^n p_i \ln\left(\frac{\bar{y}}{y_i}\right) \quad (4)$$

(2)(3)(4)式中 $y_i$ 和 $y_j$ 分别表示第 $i$ 个和第 $j$ 个样本省份农民家庭收入总水平,采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按照农村居民家庭常住人口平均计算)。 $\bar{y}$ 表示样本省份农民平均收入, $n$ 表示样本省份的数目, $p_i$ 表示第 $i$ 个样本省份农村人口数量占全国农村人口数量的比重。

为深入分析不同地域农民收入差异成因,在运用Shapley值分解法之前,基于(1)式以要素市场扭曲、农村人力资本、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业贸易开放度、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地区工业化水平、涉农政策调整等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以农民收入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农民收入决定方程。不同地域农民收入变化影响因素各异,本研究仅考察上述七大影响因素在农民收入地域差异形成中的机制与影响路径,建立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Y = \alpha + \sum_{i=1}^7 \beta_i X_i + \mu \quad (5)$$

(5)式中, $Y$ 为28个省(市、自治区)农民总收入, $X$ 为影响农民收入的七大因素, $\mu$ 表示未纳入的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基于Shapley值的农民

收入差异影响因素分解方法以(5)式回归方程结果为基础,综合使用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值等指标,通过加权平均计算三大差异指数的平均贡献率,得到七大影响因素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度和贡献大小,并按照总体年均贡献率高低对其贡献度进行排序,从而明确导致不同地域农民收入差异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 三、数据来源及其实证结果分析

#### 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借鉴施炳展、尚晓晔等研究<sup>[32,33]</sup>,本研究采用C-D生产函数估计1997—2018年中国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扭曲,并采用1997—2018年住宅用地价格与工业用地价格之比作为衡量土地要素扭曲的量化指标,最终采用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三大要素扭曲值的平均值来衡量要素市场扭曲。农村人力资本影响着占农民总收入比重最大的工资性、家庭经营性的收入变化,其与农民收入总量增长密切相关。本研究根据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计算农村人力资本:0×文盲半文盲+6×小学程度+9×初中程度+12×高中程度+12×中专程度+15.5×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村金融发展相比于城市金融过于缓慢,已成为影响中国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农村金融发展规模采用农村存贷款之和占第一产业GDP的比重来表示。农业贸易开放度以进出口农产品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进行计算。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机械化程度,因此以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地区耕地面积之比表示地区农业机械化程度,用以衡量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地区工业化不仅影响着地区资本总体报酬,还影响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和土地资源的供需,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保障。地区工业化水平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来表示。政府因势利导干预农业生产经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缺陷,但也可能导致市场扭曲进一步加剧,引致资源错配降低要素配置效率。本研究采用政府涉农财政支出与地区GDP之比表示涉农政策调整。

考虑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选取28个省(市、自治区)1997—2018年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林牧渔总产值、

年底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人口数、银行存贷款数、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状况、进出口商品总值等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9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8—2019年)、《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98—2019年)等;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财政补贴、财政支出等数据来自《中国财政年鉴》(1998—2019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9年)等。此外部分统计数据缺失主要通过查找缺失数据省市相关网站进行整理,部分缺失数据则用前后两年均值代替。为剔除物价水平变动影响,本研究以1997年为基期,采用价格指数对数据做平减处理。在进行方程估计时,出于消除异方差的考虑,对所有变量取对数进行计算。

## 2. 农民收入区域差异变动

依据(2)(3)(4)式计算出的农民收入差异变动结果详见表1。1997—2018年农民收入基尼系数持续保持在0.37左右,2004年基尼系数最低,2015年最高,分别为0.3124和0.3839,处在收入差异合理范围之内。结果显示中国近20年来农民收入差异相对较小,虽然有所波动,但是总体数值不断呈现上升趋势,趋向于国际收入警戒线。农民收入增长源泉已发生根本变化,由单一家庭经营性收入转变为主要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其他收入来源并存的多元化收入结构,农民收入增长来源逐渐走向多元化<sup>[34]</sup>。不同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引致了工资性收入差异,其已成为农民收入差异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非农就业获得的收入是导致农民收入地域差异扩大的主要因素。

表1 中国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

年份	基尼指数	泰尔指数	对数离差值	年份	基尼指数	泰尔指数	对数离差值
1997	0.328 5	0.197 1	0.131 4	2008	0.340 4	0.204 2	0.136 2
1998	0.336 9	0.202 1	0.134 8	2009	0.360 9	0.216 5	0.144 4
1999	0.336 1	0.201 7	0.134 4	2010	0.350 5	0.213 0	0.142 0
2000	0.345 1	0.207 1	0.138 0	2011	0.365 6	0.219 4	0.146 2
2001	0.350 4	0.210 2	0.140 2	2012	0.363 6	0.218 2	0.145 4
2002	0.352 2	0.211 3	0.140 9	2013	0.378 9	0.227 4	0.151 6
2003	0.357 6	0.214 6	0.143 0	2014	0.372 8	0.223 7	0.149 1
2004	0.312 4	0.205 4	0.137 0	2015	0.383 9	0.230 3	0.153 6
2005	0.317 0	0.202 2	0.134 8	2016	0.381 8	0.229 1	0.152 7
2006	0.314 9	0.200 9	0.134 0	2017	0.378 9	0.227 4	0.151 6
2007	0.335 2	0.201 1	0.134 1	2018	0.372 8	0.223 7	0.149 1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9年)等数据计算得到。

## 3. 农民收入的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基于 $F$ 统计值、LM检验及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同时使用Wooldridge检验、Pesaran检验、Wald检验,结果表明同时存在异方差、自相关和截面相关等问题,因此本研究最终选用全面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表2给出了模型FGLS估计结果,为了对比,同时列出了OLS、FE、RE等回归结果。

表2模型FGLS(4)回归结果的变量系数基本符合预期,要素市场扭曲制约了农民收入,其他相关因素都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变量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回归结果稳健。同时全面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的拟合优度 $R^2=0.8286$ ,表明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变量间的关系。

从具体影响因素看,要素市场扭曲对农民收入呈现抑制效果,系数为-0.0261,且在0.1%水平下显著,说明只有不断优化要素市场运行机制,改善要素市场环境,确保要素市场扭曲数值下降才能带来农民收入改善。这和杨柳的研究结论相一致<sup>[35]</sup>。因此要不断加快要素市场改革进程,加速农村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均衡发展,拓宽农民收入来源渠道。农村人力资本能够显著增加农民收入,其影响路径是通过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而拓宽非农就业渠道,增加非农务工收入,或是有能力应用农业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带动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农业规模经营水平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可能是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扩大,通过家庭资源配置重组改善了要素投入效率,实现了农业生产规

模效益和要素配置效率的双重效应改善,与此同时机械化水平的提升能够释放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改善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地区工业化水平能够显著增加农民收入,源于地区工业化快

速发展能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参加非农就业提升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水平,也能提高农业初级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带动农民收入总水平显著增长。

表2 模型回归结果

	OLS(1)	FE(2)	RE(3)	FGLS(4)
要素市场扭曲(SCNQ)	-0.035 7** (0.006 0)	-0.024 3** (0.008 1)	-0.022 3* (0.022 4)	-0.026 1*** (0.000 0)
农村人力资本(RLZB)	0.008 9** (0.007 9)	0.026 3* (0.015 2)	0.064 9** (0.008 7)	0.026 9*** (0.000 0)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JRFZ)	0.071 7 (0.263 1)	0.066 4** (0.005 9)	0.072 3* (0.012 6)	0.016 0* (0.029 1)
农业贸易开放度(MYKF)	0.030 6* (0.032 6)	0.020 8** (0.006 5)	0.047 8 (0.110 3)	0.041 6* (0.022 2)
农业规模经营水平(GMJY)	0.012 5** (0.008 4)	0.014 1** (0.007 2)	0.039 7*** (0.000 0)	0.011 5*** (0.000 0)
地区工业化水平(GYH)	0.047 1 (0.128 2)	0.040 1** (0.006 3)	0.070 9** (0.008 6)	0.054 8*** (0.000 0)
涉农政策调整(SNZC)	0.012 3* (0.018 1)	0.025 17** (0.005 6)	0.038 9 (0.215 4)	0.052 2* (0.039 2)
C	1 535.544 0** (0.007 3)	1878.208 0* (0.028 1)	1459.960 0** (0.007 8)	1402.744 0*** (0.000 0)
R <sup>2</sup>	0.765 2	0.843 9	0.831 7	0.828 6
AIC	327.71	253.96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5%、1%、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2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但是显著性不高,说明增收效果不明显,可能源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无法有效推动农民收入增长,今后需要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各种障碍,提升农村金融支撑农民增收的力度。农业贸易开放度有助于农民增收,但是显著性同样不高,可能源于连续多年农产品贸易逆差所形成的农业贸易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农产品贸易开放的增收效果,说明现有农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富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出口优势尚未显现,农民通过国际农产品市场交换无法改善其福利,需要进一步优化农产品贸易格局,充分发挥农业贸易开放的增收效应。涉农政策调整系数符号为正但显著性也不高,农民增收效应有限,原因在于不同地域农业生产经营条件和面临的生产经营环境不同,现有涉农政策无法有效满足不同地域农民增收的迫切现实需要,涉农政策可能存在错配。

#### 4. 分解结果

表2中FGLS(4)模型回归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农村人力资本、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业贸易开放度、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地区工业化水平、涉农政策调整等因素均对农民收入变动有显著影响。由于农民收入地域差异显著,本研究借助Shapley值分解法对不同地域农民收入差异影响因

素的贡献展开进一步探讨。表2中的FGLS(4)模型系数都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变量符号基本符合预期,与农民收入决定因素相吻合,基本符合Shapley值分解要求,故选择该模型作为Shapley值分解的回归函数:

$$\ln(Y)=1\ 402.744\ 0 - 0.026\ 1\ SCNQ + 0.026\ 9\ RLZB + 0.016\ 0\ JRFZ + 0.041\ 6\ MYKF + 0.011\ 5\ GMJY + 0.054\ 8\ GYH + 0.052\ 2\ SNZC \quad (6)$$

本研究选用LIMDEP计量软件进行农民收入Shapley值的分解和运算,结果见表3和表4。

表3、表4中农民收入影响因素贡献分解结果显示,除了涉农政策调整有助于缩小收入地域差异之外,其余六大变量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收入地域差异。要素市场扭曲对农民收入地域差异影响最大,总体平均数为0.415,排序第一,说明农民收入地域差异主要由要素市场扭曲造成。要素市场扭曲对农民收入地域差异的平均贡献率由1997年0.527下降至2018年0.318,说明随着要素市场改革进程不断加快,要素市场扭曲对农民收入地域差异的影响在下降。

地区工业化水平是导致农民收入地域差异的第二大贡献因素,其对农民收入地域差异的总体年均贡献率为0.265。从其发展趋势来看贡献率在上升,平均贡献率已由1997年0.127上升至2018年

0.337,这反映出随着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不同地域工业化进程的差距加剧了农民收入地域差异。工业发达的地区,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农民非农就

业获得工资性收入占比也大,进而造成不同地域农民收入构成比率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进一步引致农民收入总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别。

表 3 1997—2018 年农民收入影响因素贡献分解结果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要素市场扭曲	0.366	0.473	0.372	0.344	0.386	0.299	0.324	0.352	0.327	0.312	0.318
农村人力资本	0.254	0.334	0.153	0.315	0.242	0.236	0.206	0.184	0.221	0.273	0.224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	0.087	0.094	0.109	0.143	0.107	0.052	0.068	0.049	0.048	0.051	0.043
农业贸易开放度	0.143	0.139	0.211	0.111	0.088	0.013	0.072	0.126	0.105	0.112	0.119
农业规模经营水平	0.279	0.158	0.204	0.102	0.136	0.188	0.197	0.127	0.184	0.161	0.253
地区工业化水平	0.254	0.237	0.348	0.291	0.322	0.331	0.376	0.395	0.361	0.352	0.337
涉农政策调整	-0.383	-0.435	-0.397	-0.306	-0.281	-0.119	-0.243	-0.233	-0.246	-0.261	-0.294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要素市场扭曲	0.527	0.508	0.516	0.531	0.523	0.492	0.512	0.406	0.425	0.378	0.443
农村人力资本	0.269	0.283	0.209	0.277	0.214	0.315	0.275	0.232	0.216	0.331	0.203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	0.092	0.102	0.078	0.116	0.168	0.095	0.149	0.127	0.099	0.118	0.134
农业贸易开放度	0.303	0.257	0.163	0.313	0.125	0.067	0.101	0.134	0.121	0.219	0.107
农业规模经营水平	0.075	0.165	0.102	0.193	0.108	0.178	0.153	0.253	0.186	0.249	0.116
地区工业化水平	0.127	0.186	0.284	0.137	0.235	0.158	0.242	0.199	0.227	0.141	0.293
涉农政策调整	-0.393	-0.501	-0.352	-0.567	-0.373	-0.305	-0.432	-0.351	-0.274	-0.436	-0.296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9 年)等数据计算得到。

表 4 农民收入影响因素总体年均贡献率和贡献度排序

	要素市场扭曲	农村人力资本	农村金融发展规模	农业贸易开放度	农业规模经营水平	地区工业化水平	涉农政策调整
年均贡献率	0.415	0.248	0.097	0.143	0.171	0.265	-0.340
贡献度排序	1	3	6	5	4	2	7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9 年)等数据计算得到。

农村人力资本是收入地域差异的第 3 大贡献因素,平均贡献率已由 1997 年 0.269 下降至 2018 年 0.224,其总体年均贡献率占 0.248,说明农民自身素质的地域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同地域农民收入差异。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农业贸易开放度、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分别是农民收入地域差异的第 4、5、6 位的贡献因素,总体年均贡献率分别占 0.171、0.143、0.097。但从贡献变化趋势看,农业规模经营水平的平均贡献率由 1997 年 0.075 上升至 2018 年 0.253,说明不同地域的自然、社会等原因导致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差异,进而造成了农民收入地域差异扩大。农业贸易开放度的平均贡献率由 1997 年 0.303 下降至 2018 年 0.119,说明中国出口农产品对不同地域农民增收的影响呈现趋同,农产品贸易竞争力的普遍下降需要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产品贸易格局,发挥其应有的增收效应。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平均贡献率由 1997 年 0.092 下降至 2018

年 0.043,其对农民收入地域差异贡献最低,说明现有农村金融发展的农民增收支持力度不足,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导致缺乏可行的农村金融创新产品,无法满足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需要,使尚处完善发展中的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有限。

涉农政策调整对农民收入地域差异的贡献率均为负值,总体年均贡献率为-0.340,说明较为全面的涉农政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农民收入的地域差异。其平均贡献率由 1997 年-0.393 变化至 2018 年-0.294,说明随着涉农政策调整带来的地区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优化调整后的涉农政策体系能更加适应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现实需要,能够兼顾农民增收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双重目标。

####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基于 28 个省(市、自治区)1997—2018

年面板数据,综合量化分析农民收入的地域差异,发现农民收入地域差异呈逐年扩大趋势,虽有所波动,但是总体数值趋向于国际收入差距警戒线。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地域要素市场扭曲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村人力资本、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业贸易开放度、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地区工业化水平、涉农政策调整等因素均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通过 Shapley 值分解得到影响农民收入地域差异的主要因素排序显示,要素市场扭曲是农民收入地域差异扩大的首位因素,涉农政策调整是唯一缩小农民收入地域差异的因素,其余因素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收入的地域差异。

基于以上结论,要全面提升农民收入总水平,缩小收入地域差异,可从以下方面加以精准施策:1)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不断优化要素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提升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市场化水平,充分利用公平、合理、高效的市场交易机制,发挥市场机制在各类要素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提升农民参与市场交易的地位,全面提升农民获得要素报酬的水平;2)继续优化调整涉农政策组合,进一步理顺各类涉农政策的农民收入增长路径,结合不同地域农民增收受阻所面临的主客观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涉农政策组合,提升不同地域涉农政策支持的精准性;3)要针对不同地域已有工业基础和要素资源禀赋,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要结合当地特色优势资源,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体系和优化产业布局,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吸引农民参加非农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进而缩小农民总收入地域差异;4)继续保持农村义务教育水平,不断扩大对农民的各类培训,全面提升农民素质,使农民具备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基本技能,为缩小地域差异积淀人力资本;5)因地制宜提升农业规模经营水平,加大对农业技术研发投入支持力度,加快土地流转规模,全面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让部分农民获得稳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收益,优化农民收入构成;6)针对不同地域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生产贸易特点,改变当下农产品贸易逆差格局,全面提升农业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多种资源,扩大优势农产品贸易的增收福利效应;7)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和引导农村金融市场有

序健康发展,采取差异化的农村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尤其是应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市场发育,发挥农村金融提升农民收入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Johnson D G. Can agricultural labour adjustment occur primarily through creation of rural non-farm jobs in China? [J]. *Urban Studies*, 2002, 39(12): 2163-2174.
- [2] 韩俊. 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性因素[J]. *求是*, 2009(5): 35-36.
- [3] Gregory Veeck. Rur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farm household income in Jiangs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4, 13(41): 801-817.
- [4] 陈锡文. 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4(2): 5-13.
- [5] 史清华, 晋洪涛, 卓建伟. 征地一定降低农民收入吗: 上海 7 村调查——兼论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与改革[J]. *管理世界*, 2011(3): 77-82, 91.
- [6] Iddo Kan, Ayal Kimhi, Zvi Lerman. Farm output, non-farm income and commercialization in rural Georgia[J]. *Agricultural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 2006(3): 276-286.
- [7] 宋洪远. 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和建议[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10): 18-21.
- [8] 刘俊杰, 张龙耀, 王梦珺, 等.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来自山东枣庄的初步证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6): 51-58, 111.
- [9] 高梦滔, 姚洋. 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 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 [J]. *经济研究*, 2007(12): 71-80.
- [10] 王轶, 詹鹏, 姜竹.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与城镇居民和未失地农民收入差距研究——基于北京地区的调查数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4): 121-139.
- [11] 钟钰, 蓝海涛. 中高收入阶段农民增收的国际经验及中国农民增收趋势[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 33(1): 73-79, 112.
- [12] 史本林, 万年庆, 关丽娟, 等. 我国农民收入时空差异的地域与因子结构双重解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2, 31(4): 9-13.
- [13] 关浩杰.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变动与收入波动的关联性分析[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3, 10(3): 17-23.
- [14] 王春超. 农村土地流转、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 基于中国 17 省份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2011(1): 93-101.
- [15] 穆红梅. 论农民收入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为例[J]. *人口与发展*, 2016, 22(2): 64-71.
- [16] 陈英乾. 中国农民收入的地区性差异及对比分析[J]. *农村经济*, 2004(12): 68-70.

(下转第 44 页)